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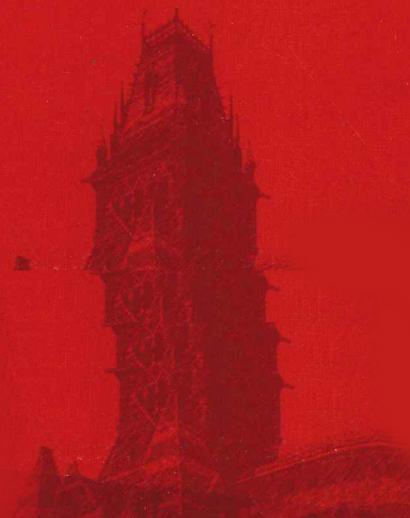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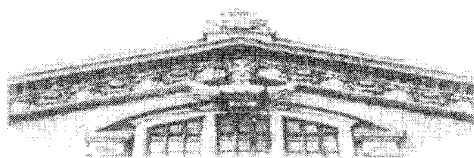
#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哈佛委员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哈佛委员会 著  
李曼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哈佛委员会著;李曼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

(大学之道丛书·第三辑)

ISBN 978-7-301-18062-4

I. ①哈… II. ①哈… ②李… III. ①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8528号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by the Harvard Committe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mes Bryant Conant

1945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著作责任者: 哈佛委员会 著 李曼丽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周志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62-4/G·29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yl@pup.pku.edu.cn](mailto: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230千字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译者序言



《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本书中译本也称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是美国教育史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部经典文献, 1945年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1980年, 范德比尔特大学(University of Vanderbilt)教育史学家帕克(Franklin Parker)在美国学术期刊《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上发表的长达22页的论文 *Turning Points: Ideas in Books Affecting American Education*, 分析了对美国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最大的10本书。其中, 他把《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并列为对美国教育史具有重大影响的10本著作。<sup>①</sup>

2000年, 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AC&U)发表的一份题为“本科教育大事记”的报告, 回顾了现代(1945年—1999年)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被提及的事件中, 由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撰写、发表于1945年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高居第四位。

另外, 在美国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AC&U)所列举的与美国本科教育相关的31件大事中, 有4件是关于著作出版的。这4本著作中

---

<sup>①</sup> 这10本著作是: *Readers* (William H. McGuffey, 1836—1944),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lexner, 1910),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Terman,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Dewey, 1916), *Dare the Schools Build a New Social Order?* (Counts, 1932),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The Harvard Report, 1945),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Bruner, 1960),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oleman, 1966), *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 (Katz, 1968),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Skinner, 1971)。



的第一本就是哈佛大学 1945 年出版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另外三本分别是:《贝尔报告》(*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1966, Daniel Bell);《哥伦比亚报告》(*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 Columbia Report*, 1977);《狄百瑞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Core Curriculum [De Bary Report]*, 1988)。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确在美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它是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问题的不可避免的重要报告。

关于本书的成书背景,众所周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经济的暂时繁荣,带来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补充大量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知识的扩展要求改变课程组织,更新教材内容,注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公民意识和思维能力。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教育思想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美国教育为什么差强人意?教育改革怎样进行?对此,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组织该校 12 名各学科的专家、教授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早在 1943 年春,科南特任命了分别来自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 12 位专家教授,组织专门委员会来筹划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其任务是探讨“通识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目的”。1945 年,该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书,即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反映了当时哈佛大学不同学科里的 12 名专家、教授对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发表,反映了哈佛大学实施通识教育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构想,揭开了哈佛大学全面实施通识教育的序幕,使得通识教育从几所高校的尝试变成全国性的运动,使人文教育再次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通识教育在美国大学走向制度化的象征,也使美国本科教育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报告成为美国数百所大学新的课程改革浪潮的主要推动力。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就是从 1945 年哈佛大学提出《哈佛通识教育



红皮书》的报告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国家,如何通过高等教育在文化遗产以及现存的可贵经验中进行认同、择取都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把哪些有价值的知识内化成为年轻人心智的一部分,可能一直是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不得不审慎对待的问题。在我看来,重读和翻译《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对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有助于我们在教育哲学层面上正确地理解高等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指出,高等教育应该致力于培养“成人”(manhood),不仅要使学生学会“做事”(to do),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学会“做人”(to be)。本书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需要的过分功利化的教育价值观,主张大学的发展要遵循自身的逻辑,以追求真理为崇高理想。本书指出,现代大学教育不仅应当进行以培养科学知识、技能、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而且同时应当进行以提高人的基础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通识教育,即现代高等教育要坚持通识与专识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这一观点自本书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国际高等教育界有识之士的认同。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历经了几起几伏。例如,每当人们在战争、生态、能源、人口、道德等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时,过分偏重专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则会成为人们的批评对象之一,通识教育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探索中,情形也非常类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就迫切要求高等学校在指导思想上加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要求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课程安排上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在培养过程上将关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总而言之,都可以归结到如何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经典的话题上。这与半个世纪以前《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所表达的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形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哈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是针对当时美国社会各界关于高等教育之目的与课程理论的种种争论所做的积极的、充满理性的回应,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重读中进一步获得思想的力量。

其次,重读和翻译有助于澄清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中已经或正在流传的两种对立的误解,即:第一种看法是“高等教育就等于通识教育”;第二种看法与之相反,则认为高等教育之所以被称为高等教育就在于“专业性”,因此将高等教育完全等同于专业教育。从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尽管一直存在着两种相左的教育思想观念,但实际上这两种价值观并非绝对对立。毕竟,价值的多元性是一个社会现实,任何一方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观念是可以调和的,甚至可以找到其结合点。《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该书的出发点是针对教育中的过分专门化、实用化的忧虑,但报告并不反对专业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反,它还指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和专业教育(special education)。……‘通识教育’……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的教育。”而且,它还特别指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不是两种教育,而是一个人所应该接受的教育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割裂,它们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的目的。这一思想被国际高等教育界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后半叶大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读和翻译这一经典著述,可以帮助我们消解关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一些成见,帮助我们建立起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机结合的大学教育观。从时机上看,翻译本书既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但是在以往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观点,就是本书不仅提出了大学教育阶段的关于通识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框架,而且指出了通识教育是一个贯穿于人的一生各个不同阶段的持续的过程。本书针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过分专业化和功利化的弊端,认为广泛而全面的知识,只有在一种科学的结构中才能成为有序的、完整的、系统的知识,而非散乱的、庞杂的、零碎的知识,从而取得教育上的合理性。每一门类的知识,按其深入程度均



可分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按其抽象程度可分为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与通常只涉及特殊技术的直接应用的专门知识相比,理论性的基础知识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作为知识和文化体系的一般基础,相对地讲,则更为稳定不变。教育的重点,应转到接受基本原理、基础的公理和带普遍性的主题上来。学生学到的概念越是普遍而深刻,对新知识和新问题的适应性就越强,通识的能力主要来源于深厚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基。该书所提出的课程计划要求每个大学生毕业时修满 16 门课程(学年课程),其中应有 6 门是和通识教育有关的。这 6 门课程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学生必须在人文课程中的“文学名篇选读”、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制度和思想”和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中选修一门(或选一门两者结合的课程),再从这三个领域中各选一门较高深的或跨学科的课程,如“人类关系”、“科学史”等。《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所提出的观点和课程方案构建了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哈佛以实施通识教育为其目的的核心课程的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虽然是哈佛大学为了解决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而进行的研讨,然而在研究中指出通识教育是一个教育的系统工程,本书的内容也涉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大学以及学校后教育的各个阶段,指出民主社会中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应该注意不同教育阶段通识教育内容的衔接。因此,本书可以被看做是对民主社会中的通识教育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想。本书提出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努力培养“全人”(Whole Man)。全人不是抽象的,而是指“好”人(Good Man)、善良正直的公民(Good Citizen)和有用的人(Useful Man)。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其逻辑起点和理想目标的通识教育,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人才观和教育价值观;主张从追求割裂的、残缺的知识,转向追求广泛的、全面的教育内容;主张从单一的、片面的培养目标转向完整的、全面的培养目标;从相互脱节和对立的教育体制,转向完整的、统一的教育体制,并对中学阶段、大学后阶段的通识教育的实施提出了框架性的设想。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在以往的研究和论说中关注较少,相信本书中译版的问世会使我们的教育研究人员、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如何通过完整的、统一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来实现我





们的教育理想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1945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问世,不仅宣告了现代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重大意义,而且呈现了对高等教育、通识教育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见识深邃,目光远大,它在观念上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超越了所处的时代。虽然,科南特校长及其12位同事中的大多数已经作古,我们依然在此要对当年为“红皮书”的撰写和发表作出过贡献的他们深表致谢,向他们的博学、睿智和深邃致敬!

李曼丽于清华园

# 科南特导言



战争促使众多探讨教育问题的书籍和文章纷纷出炉。尤其是,文理学院的未来已经在学术界内外成为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主题。在近几年的战时岁月里,我们国家的几乎每个大学或学院都有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考虑教育的基本问题,并制订课程改革的计划。同时,一些较大的团体组织也很活跃。例如,美国学院协会(AAC)不仅资助出版了一本研究文理学科(liberal arts)的著作,还安排了许多重要会议,讨论涉及学院教育(college education)方方面面的问题。一旦知晓了这些背景,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应该将另一个大学委员会的报告以著作的形式呈现给公众?读者也许还会问,学院教育是大家都熟悉的主题,但是我们却给予它如此特殊的对待,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蕴藏于事实之中。尽管这本书起源于对学院教育的思考,但是学院教育并不是它关注的主要问题。相反,它是主要由文理学院教员所组成的委员会针对中学和学院的通识教育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和探索,委员会成员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享有声望。换句话说,哈佛委员会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报告(本书收录了其全部内容)呈现了对美国教育全景的理解。其中,有关改革哈佛学院课程的建议(到适当的时候将会经过全体教员的讨论)是委员会历经数月,在充分考虑为所有的美国青年提供适当的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在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份专家报告;在另一方面,它也是由一群决心寻求真理的门外汉组成的公正的评判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

这个致力于大学事务的团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调查美国



的教育现状,我相信,这一壮举是史无前例的。此外,教育学院的同事们也参与进来了。他们经验丰富,熟知各级学校的情况。这一点使得这个团队的工作不同凡响。因此,这本书的前四章是美国教育史中独特的研究成果。

这份报告的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它并非是基于不同的分歧意见而达成的折中方案,而是获得了委员会成员的一致通过。显然,如果考虑到委员会的成员既有文理学院的教员,也有来自教育学院的教员,那么此报告能毫无异议地通过就不仅是罕见的,而且还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让人不胜惶恐的是,学校里“教育专家及中小学教育工作者”与“教授”之间一直保持着对立。因此,双方这次达成了共识,就仿佛让人看到了欢迎破晓的晨曦。虽然本导言的作者是“有偏见的目击证人”,但是在他看来,本书前四章还是传达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迹象,即本科学院教授和专业学院教师以及管理人员如果愿意齐心协力、共同协作,那么他们就能够理解彼此的困难。因为我认为,委员会的成员最先感受到的一点就是:正如在通常的学术委员会中所发生的那样,如果他们只有在进行了数月的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写出一份报告,那么一旦他们在研究中缺席,对所研究问题的性质达成理解和共识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本书不妨称为“美国教育研究”。

转送函中曾简要提过委员会实施此项研究的方法。但是,一个粗心的读者如果不加留意,就很容易忽略一个重点,即委员会不仅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来考虑所研究的问题,而且,在相当于多至数周的时间里,每天工作8个小时,用于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除了时间上的投入,此项研究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众多合作者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声望,而且委员会成员还跟许多其他中学和学院里的那些访问坎布里奇\*的学者就研究内容进行了交流。当然,这使得研究经费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大家都认为一个由教员所组成的委员会不应有如此巨大的花销。实际上,哈佛大学董事会拨给委员会的6万

---

\* 坎布里奇(Cambridge),位于马塞诸塞州波士顿的西郊,坎布里奇又译剑桥城,是哈佛大学所在地。本书脚注中加星号(“\*”)者,均由译者所加。



美元是对其工作的经济成本的相当精确的估算。至于时间和精力上投入的成本,严格来说,是无法准确衡量的。但是,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它跟学校在这个研究上投入的金钱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通常,正是因为这种成本才会使得此类研究昂贵得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本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使得本研究势在必行。

本书的读者在感受了作者对研究成果所持有的热情之后将意识到,哈佛大学应该感谢转送函上所提及的 12 位委员会成员。其中,首先应该感谢委员会主席、文理学院院长保罗·H. 巴克(Paul H. Buck)教授。熟悉委员会工作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在此项目中所显现出的才华,如果没有他的有效管理和大力支持,研究者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就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

本书适合三类读者:关注中等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关注大学和学院问题的教育家(这一类读者也包括人文、艺术和各专业学科的所有教授,不管他们是否满意这种分类)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在此,我们需要提醒第三类读者:一本书,即使它只是一部教育报告,也要求人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对于中学和学院的老师和管理人员而言,情形也许略微不同。但是,每类读者都有可能只对自己关心的问题予以关注。因此,我要提出一个严肃的警告:经过断章取义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对本书的作者是不公平的。这本书的内容前后关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比方说,第五章研究了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的问题,它对其他大学的本科学院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将这一章的内容同前四章分开,那么对其造成误解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第四章的内容,它论及了中等教育的一些问题。

有些读者在打开此书时就存有一些偏见,偏见也许来自于对书名的不理解。“通识教育,”他们可能说,“那是什么?我只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感兴趣——那才是我们国家现在所需要的。”在此,我用“通识教育”这一术语代替了“自由教育”,而且,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可能的责难。在委员会任命后不久(确切地说是在 1943 年 1 月),我曾经向哈佛大学的监察委员会做过如下汇报:



我任命了一个大学委员会负责实施“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的研究项目。这个委员会成员主要包括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里的一些教员,我希望此研究能够在中学和学院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代人中的绝大部分都能接受通识教育,而非少数进入四年制学院的学生。……

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传统和人文传统的传递。无论是单纯的信息获取,还是具体的技能和才干的发展,都不能给予我们维持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广泛的思想基础。没有人能够否认“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即便一个人有着良好的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基础,同时还能够用好几门外语进行读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合格公民。因为这样的教育并没有与其个体性的情感经历和社会实践经验联系起来。它几乎没有曾被称为“时代智慧”的内容——这种“时代智慧”现在我们更愿意叫做“文化模式”。它也没有容纳历史、艺术、文学以及哲学等内容。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在每个教育阶段都持续地向学生提供进行价值判断的机会,否则就达不到理想的教育目标。无论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不仅应该从数学意义上,还应该从道德伦理层面上判断事物的“正确”和“错误”。除非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了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理想的重要性——它们是人类生命中的深刻的驱动力,否则他们很可能作出盲目的判断。

这些教育目标本身并没有创新。20世纪美国的创新之处就是这些教育目标被应用到了全民教育体系之中。基于“书本学习”的正规教育曾经是专业教育的唯一方式,最近,它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而越来越广泛地受到重视。过去,某些语言知识和历史知识的传播被限制在少数人中间,这极大地提升了这些知识的威望。那些具有“良好品味”的少数人一代代地维持着这种品味的水准。但是,今天,我们关注通识教育——自由教育——并非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多数民众。

不管一个人是否愿意在学院层面上将“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



等同起来,在综合考察美国中学和学院(schools and colleges)的多样化行为时,他都会发现“通识教育”更具有优势。如果本研究仅仅关注哈佛学院,那么本书的题目应该改为“自由教育的目标”更为合适。但是,这将很快引起一个小小的麻烦,那就是,各学院(faculties)的专家们都乐意雄辩地证明一点:他们的专业如果被正确地教授,恰恰就是自由教育。然而,我们改用通识教育这一术语之后,这样的主张就再也没有发生。对于一个被学校任命来研究自由教育的大学委员会而言,除了对于“自由”这个被大量使用并且经常用错的形容词的概念进行争吵之外,或许已经很难对美国中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任何严肃的探索。原因在于,美国教育在本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教育家”和“教授”之间的分裂状况,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了。跟神学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教育中的用语也变成了口号、标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在此希望,当通过一群大学教授——科学家、古典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视角来探索美国教育系统目前的状态时,本书的读者能够尽可能地摒除自己一时的教育偏见,忘记众多的陈词滥调。我同时还希望,当这群大学教授在思考美国的民主政治该如何塑造自由社会的未来并稳固其根基时,读者能继续支持他们。

詹姆斯·B.科南特

于坎布里奇,1945年6月11日

## 报告呈送函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校长

哈佛大学

阁下：

1943年春您任命了一个大学委员会，协同文理学院、教育学院的教师一起，旨在研究“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您给委员会的任务指令非常广泛，如同它的名字本身一样长。我们被要求考虑中学和学院两个阶段的通识教育问题。您提醒我们说，每代人中在高中就读的绝大多数人的通识教育，比在四年制学院就读的相对数量较少的人的通识教育更重要。您还建议，如果教育过程的每个阶段没有囊括那些与通识性的、人文的课程有关的东西，教育过程就会缺乏理想。这些课程的目标，正如您所说，是一个长期探讨的话题。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但是尚存不足之处，主要指这个问题的独特性在某些程度上没有得到重视。“这些教育目标本身并没有创新，”您断言，“本世纪美国教育的创新之处就是这些教育目标被应用到了全民教育系统之中。”

总之，我们被要求去做的与其说是为哈佛学院提供有关通识教育的建议，还不如说是涉足美国教育经验的广袤领域，即探寻通识教育的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所珍视的自由社会非常有用。就像哈佛学院的教育能为美国的民主作出特殊贡献一样，通识教育的概念一旦形成，也将为美国的民主作出特殊的贡献。

我们在这里呈现给您的这份报告，应该从这种视角来阅读，这



是其主要目的。我们希望它能激发讨论,并且希望它能够付诸实施。我们认为,对哈佛学院所提出的建议如果离开前面关于背景、理论和哲学等章节的讨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报告是一个整体。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能够通读此报告,并从委员会成员共同探讨的经验中获益。这个报告是我们 12 个人经过两年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共同探索这个复杂棘手而又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很规律地每周聚一次,并且频繁地定期召开持续几天的封闭会议。我们有一个中心办公室,它存有大量的备忘录,同时也是委员会部分成员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得到的意见和建议一方面来自我们大学里的同事,另一方面也来自国家里各行各业的人们。我们将众多的顾问(个人的、团体的)带到坎布里奇。我们依靠下属的分委员会以会议的方式进行运作。总之,我们尽其所能地利用现有的关于美国教育的丰富多样的思索和经验。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也得益于哈佛大学的校长和哈佛学院的同道在资金方面给予委员会的慷慨援助。

在强调这个报告中的合作性质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委员会达成的观点的一致性。值得一提的是,这 12 个人,他们在教学和学术兴趣上各有专攻,但在经过了一段时期亲密的合作研究后,他们就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内容达成了共识。委员会在所有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上都达成了一致。在将一般原理应用于实践的方面,委员会通过协商解决了小小的分歧。当然,在一些细小的枝节问题上,某些观点上的分歧也仍然存在。

最后,我们很愿意提到您在 1943 年 1 月 11 日呈送给监察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话,其间您描述了您任命这个委员会的目的:“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它是要将自由的和人文的传统灌输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之中。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最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和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的人。”

当这份报告交到您手上时,您将发现这个主题占有主导地位。通



识教育是美国教育系统中迫切需要的一个概念。只有它能指引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国家的未来作贡献。

忠诚的

主席 保罗·H. 巴克(Paul H. Buck)  
副主席 约翰·H. 芬里(John H. Finley, Jr.)  
拉斐尔·戴莫斯(Raphael Demos)  
雷·霍德里(Leigh Hoadley)  
拜伦·S. 霍林席德(Byron S. Hollinshead)  
威尔伯·K. 乔丹(Wilbur K. Jordan)  
艾弗尔·A. 里查德(Ivor A. Richards)  
菲力普·J. 茹伦(Phillip J. Rulon)  
亚瑟·M. 史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罗伯特·尤利希(Robert Ulich)  
乔治·瓦尔德(George Wald)  
本杰明·F. 怀特(Benjamin F. Wright)

